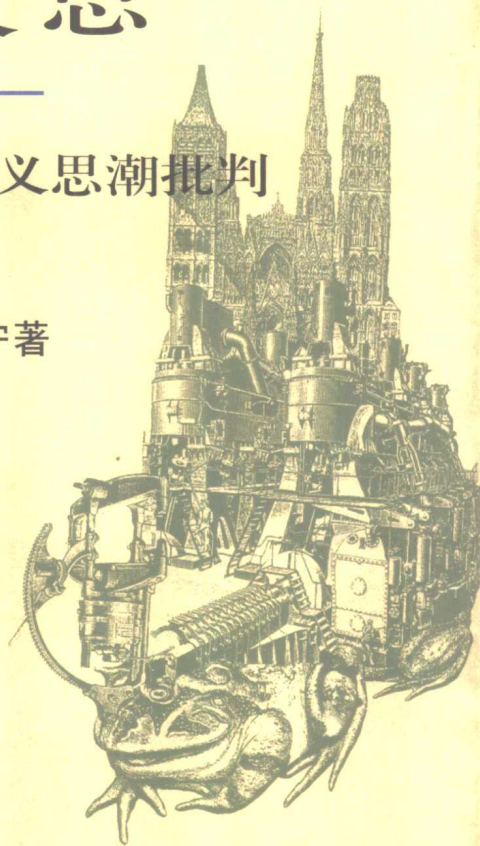




人文困惑 与反思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

盛宁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三联 ● 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人文困惑
与反思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

盛 宁著

生活 · 读书 · 新知 三联书店

Our Academic Books
are subsidized by
the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we hereby express
our special thank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盛宁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6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
ISBN 7-108-01033-X

I. 人… II. 盛… III. 后现代主义-研究-西方国家 IV. I109.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05577 号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新知电脑印制事务所
印 刷 北京印刷一厂
版 次 199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
字 数 204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16.00 元

本丛书系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丛书，
面向海内外学界，
专诚征集中国新进中青年学人的
优秀学术专著(含海外留学生)。

•

本丛书意在推动中华人文学术与
社会科学的发展进步，
奖掖继起人材，鼓励刻苦治学，
倡导基础扎实而又适合国情的
学术创新精神，
以弘扬光大我民族知识传统，
迎接中华文明新的腾飞。

•

本丛书由哈佛大学燕京学院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共同负担出版资金，
保障作者版权权益。

•

本丛书邀请国内资深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组成丛书学术委员会，
并依照严格的专业标准
(原则上要求参选书稿高于一般博士论文水准)，
按年度评审遴选，
决出每辑书目，保证学术品质，
力求建立有益的学术规范与评奖制度。

引 言

持续了不少年头的关于西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有点像一颗光焰夺目的彗星，在当今文坛的上空划过一道闪亮的圆弧之后，现在终于拖着长长的尾巴渐渐地远去了。曾几何时，“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这些本身界定就不够清楚的术语，被炒得沸沸扬扬，乃至所有的“主义”一夜之间仿佛都落伍过时了，若不赶紧添上一个带“后”字的前缀，那就很可能要被剥夺继续存在的理由。理论竟也变得如此的浮躁，实在令人不可思议。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有一个或隐或显的声音似乎一直不绝于耳，那就是西方都已经后现代了，我们该怎么办？面对西方讨论的“后现代”而提出上述这个问题，应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这里至少包含着一种对于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比较，其中也许还有一种思想上的准备，即早晚有一天当我们也实现了现代化以后，是否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然而，仔细检索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坛上对于西方后现代问题的介绍和评述，情况却不是这样，其中似乎更多的是一种“话语的平移”。

我所谓的“话语的平移”，包括两层意思。首先指在对西方思潮的热点进行考察时只把具体的理论概念、论点和命题抽出，不太注意这些观点和说法所产生的背景和语境，不太注意这些观点和说法的背后更隐蔽的动机和所指，因而有意无意地将本

来是有特定所指的概念当作了某种普遍性的命题。这一点,要认识并不难,但是却难以做到。学术素养的欠缺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多的往往是缺乏足够的耐心。

譬如,谈及“后现代”,势必都要提及法国后结构主义学者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而提到利奥塔,自然就要说起他所谓“宏大叙述”解体的高论,人们每每就要提及他那句“向同一性开战”的口号。“向同一性开战”,这似乎已被认为是利奥塔作为一个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的界定标识。仅仅这一句话,可以被引申出的意思就太多了,而流传最广的一点共识,就是把“后现代”等同于“向一切同一性开战”。这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然而这样的一个认识,又实在太粗泛,太大而化之了。利奥塔所谓的“同一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利奥塔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向同一性开战的?利奥塔向所谓的同一性开战还有没有他的最终底线?所有这些问题,在大量的讨论“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文章中,却似乎很少有涉及的。

其实,美国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文论家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对利奥塔的后现代理论背景就曾有很好的分析,问题是没有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詹明信认为,利奥塔的“后现代”话语是在两大思想理论背景上展开的,这两大背景又可以说是两个大大的“神话”,即由于被人反复地言说而不再对其自身的合理性加以论证的那些大叙述:一个是所谓“人类的解放”,另一个则是“思辨的同一性”。前者是西方启蒙运动,更具体地说是法国大革命留下的思想传统;后者则是日耳曼、黑格尔式的思想传统。这两个传统已经成为人们对自己一切行为进行解释的依据和出发点。而现在,我们是不是有必要对我们不假思索就作

为依据和出发点的假设提出一点疑问呢？而就在这些提问和回答的过程中，里面包含了各式各样很微妙的错位：比如利奥塔针对的所谓启蒙运动留下的“人类的解放”的神话，显然只是指被纳入了空想社会主义的那一脉，因而当他把“马克思主义”也与启蒙运动挂钩时，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实际上与我们就有一种本质的区别，因为他所谓的“人类的解放”，并没有经过马克思的“从空想到科学”的扬弃。再比如，利奥塔所谓的“同一性”，固然指黑格尔所代表的日耳曼思辨传统，即先行认定一个先验的、统一的、绝对的理念，它统领一切，包容一切等等，然而，利奥塔又有他更具体的所指，这就是由当下德国哲学最主要代表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交往共识”说。利奥塔认为，哈贝马斯所谓通过话语交往能够过渡到一个遵循理性共识社会的设想，纯属一种植根于“同一性”的哲学传统的残留。而这种“同一性”之所以要被否弃，因为在利奥塔看来，所谓“共识”的理想，即使不是“强制性的”，也是一种对于“服从”的推崇。

这里看来有必要对存在于当代西方知识分子中的一种普遍的心态作一点阐述。在一定意义上，西方知识分子对于资本主义体制的“大一统”（monolith）状况，可以说向来具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惧。过去的浪漫主义也好，世纪之交的现代派也好，直至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新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新左派等等，他们都对资本主义进行过批判，有些批判应该说还是相当激烈的。然而，他们发现，他们所面对的资本主义体制、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体现这种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话语，却好像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包容力似的，作为个人，无论你采取怎样的反抗方式，结果就好像孙猴儿逃不出如来佛的掌心一般，到头来总还是

要被资本主义的这套话语招安收编。右翼势力最为猖獗、对左翼进步势力的迫害最甚时期，当属以“麦卡锡主义”为标志的五十年代。美国学者艾伦·特拉亨伯格(Alan Trachtenberg)在描述西方战后的知识界思想状况时指出，整个五十年代可谓“服从的年代”(age of conformity)，而在战后将近二十年期间，美国人从媒体上所能读到、听到、看到的，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对于所谓“美国生活方式、美国世纪的颂扬”。那么，反叛和批评的声音有没有呢？有，但是非常的微弱。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理查德·霍夫斯塔德(Richard Hofstadter)这样一些学者认为，战后西方知识分子产生了一种“崇尚自我放逐”的倾向。^[1]

所谓“崇尚自我放逐”，无非是一种个人的、与中心意识形态保持距离的态度，出于对中心意识形态的恐惧而自己选择了一个边缘位置，然而他们所惧怕的对象实际上却是游移不定的，它可能是一个笼统的资本主义，但它更可能是所谓“斯大林主义”式的共产主义。战后美国的知识分子有这样的倾向，战后法国的知识分子也有这样的倾向，利奥塔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代表。他步入思想理论界时，是法国意识形态冲突异常激烈的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1968年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学潮和工人罢工，导致了戴高乐政权的倒台，然而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又导致右翼势力的复辟回潮，左翼和右翼、激进和保守，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詹明信指出，利奥塔是在所谓法国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之后开始写作的，而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传统的一种全面反动，其矛头所向，在哲学层面上就是黑格尔/卢卡契的“同一性”(totality)概念。利奥塔本人于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曾加入所谓“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激进组织，但在被詹明信称之

为“相当麦卡锡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出现之前，他就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认识了这样一个背景，我们也就比较容易解释，为什么哈贝马斯会赞同包容同一的日耳曼传统，而身处法国思潮旋涡之中的利奥塔，则高扬起了“向同一性开战”的大旗了。^[2]

如果说上述那种“话语的平移”主要是指在西方文化传统之内将特殊性与一般性混淆的话，那么，还有一种“话语的平移”，则指的是忽略东西方的文化传统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以及所面临的问题的差异，把本来是西方的文化传统无条件地搬到了东方，嵌入我们的话语系统。其结果，不仅与上述那种“话语的平移”一样，会把原本一种比较复杂的现象简单化，而更为不幸的是，它还将引起我们自身一系列的思想混乱。

八十年代，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我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学术往来日渐频繁，经历了文革十年禁锢的中国学界，与外界乍一交往而受到的冲击和震动，今天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恐怕是很难体会的。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国外（主要是西方）思想文化理论界所有时兴的观点，几乎都被引上中国文坛一一亮相，所谓“后现代主义”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刚刚把“现代化”确定为奋斗目标的国人来说，这个术语实在是有点费解，然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就在人们还不太明了这个术语的外延和内涵的时候，已经有那么一些学者，言之凿凿地咬定中国也产生了“后现代主义”，理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把中国紧紧捆绑在‘现代化’这驾马车上，冲破一切阻碍去追赶发达国家。”^[3]

但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一下他们所谓的“后现代主义”，那就会发现，他们实际上只是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种文学创作时尚来理解的。比方《无边的挑战》一书的作者就认为，八十年

代中国文化潮流，由“思想解放运动”和“对西方现代思潮的追逐”两部分组成，而他所列举的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代表，不过就是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那几位实验派的小说家和诗人。于是作者断言，“大量西方现代派作品和理论批评被评介，给当代中国文学造成巨大的冲击”，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是与“现代主义”几乎同时涌入中国大陆的，只不过它被当作“现代主义”加以接受和借鉴，而这种“误读”是一种历史的“弄拙成巧”。所以按照这样一种看法，所谓中国出现的“后现代主义”，只是一种对于西方战后的先锋派、实验派文学的一种模仿和紧跟。

然而，冷静地回顾一下那段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后现代主义”之所以会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成为一个“响词儿”，实在是应该归因于某个特别的契机，以及为数有限的几部论集在国内的传播。这个契机是美国著名文论家詹明信教授于1985年9月至12月在北京大学的讲学，他的讲稿很快译成中文，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为题出版，在中国文学界和文化理论界产生过很大影响。而国内学界接受“后现代主义”概念，被作为主要依据和参考的则是两部论著：一部是美国最早从事“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的批评家伊哈卜·哈桑（Ihab Hassan）的《后现代的转折》（*The Postmodern Turn*, 1987），此书开始并没有全译本（直到今天全译本也只是台湾版的，未在大陆学界流行），但哈桑的主要观点和他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来龙去脉的介绍，曾受到国内学人的广泛转引；另一部是荷兰学者佛克马（Douwe Forkema）和伯顿斯（Hans Bertens）编选的论文集《走向后现代主义》。此书英语原名“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其意思无非就是“对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研究”，不知译者何以要译成“走向后现代主义”。此书投放市场以后，“走向后现代主

义”于是只能按照中文的意思，不由分说地成了某种你我概莫能外的归宿。^[4]

詹明信、哈桑、佛克马等在他们各自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的确都是非常重要的学者，而由于他们与我国学者有着这样那样个人的联系，他们的著作和观点于是就率先被介绍到了国内学界，但是，他们的学术方向和重点，他们在当代西方文论领域的理论地位和实际影响其实是很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在引用他们的个人观点时，就应该有一定的辨析，不能一概而论地当作是在美国、在西方被普遍采纳的共识。詹明信在美国的文化批评领域可以说是“处于前导地位的理论家”（a leading theorist），他的许多论点和表述都有一定的原创性，但是，若把眼光扩大到包括西欧各国在内的整个西方思想理论界，那么公允地说，詹明信的观点充其量仍只能算是众多理论中的一家之言，在“后现代”问题上，他与法国、德国、英国的一些重要学者都有不小的分歧。哈桑的专长是对西方现代派、特别是战后先锋派文学的研究，他对“后现代主义”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文学问题。他在西方后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毫无疑问是领先的，但是，当“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成为西方思想理论界众说纷纭的一个话题后，他主要从文学视角归纳出的“后现代主义”，就必须给以某种限定，不能泛泛地等同于社会文化意义上那个涵盖面更大的“后现代主义”了。而作为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前主席的佛克马教授，曾著有《文学史：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Literary History,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1984），与伯顿斯、与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分别选编过《后现代主义问题研究》（*Approaching Postmodernism*, 1986）、《后现代主义探索》（*Exploring Postmodernism*, 1990）等论文集，他对于梳理西方后现代思潮，

特别是梳理西方当代文学的发展脉络提供了很好的见解,但在对于“后现代”的理论定位上,他或许还不能跻身原创性理论家的行列。

“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应该说这是一个需要极其慎重对待的、重大的理论命题。说它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这一命题需要进行非常周密的理论论证,而是因为它从根本上牵涉到了我们应该不应该把西方考察社会的理论框架现成地搬来,作为我们看待问题的认识框架,进而牵涉到了我们究竟要不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即我们在自己民族的文化建设过程中,要不要提出和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等一系列的重大理论原则。所以,争论的焦点并不是“中国有没有出现后现代主义”,因为这样的争论一开始,争论的双方其实都在认识前提下接受了“后现代主义”这个本来应是个问题的认识假设。“后现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这些即使在西方思想理论界,也是作为“问题”提出来讨论的,那些认定应该作“现代”与“后现代”分期的学者所列举的种种“后现代主义”的文化现象,对于不同意这种分期的学者来说,则完全可以有其他不同的命名。比如詹明信是主张“后现代”分期的,然而他却有言在先:“后现代主义并不是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然后就心安理得地加以运用的东西。这个概念,如果确有这个概念的话,那它也应该出现在我们的讨论之后,而不是在讨论之前。”^[5]

需要强调的是,“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这是西方学者在他们自己的思想理论传统内提出的一个问题。詹明信把“后现代主义”界定为“当下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即是说,这是对于发展到当前阶段的资本主义文化的一种研究,在这里,他显然不是把“后现代主义”仅仅当作一种

文学现象和一个文学问题来看待的。而即使从文学切入来界定“后现代主义”，这“后现代主义”似乎仍打着西方文化传统的印记。例如佛克马，他在专门为《后现代主义问题研究》的中译本写的序言里就明确指出：“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后现代’这一术语可作为分析和理解当代文学和思想——至少在欧美是这样——的一个有用工具”；“包括后现代主义在内的任何文学思潮都有着自己的地理学的、年代学的以及社会学方面的局限。……但迄今这一概念仍然毫无例外地几乎仅限于欧美文学界”；“对于这一术语之限于西方世界，也许可作一番解释。后现代作品与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相联系，它批判了陈腐的个性和既定的等级制度。……后现代主义作家表现出的对无选择性（non-selection）技法的偏好，这一点似乎正是十分顺应经济兴盛的形式。西方文化名流的奢侈生活条件似乎为自由实验提供了基础。”很明显，佛克马心目中的“后现代主义”，特指当代欧美流行的一种文学实验，这种文学实验之所以产生，他认为是一定的经济和社会的背景的，也就是说，只有当社会发展到那样一个阶段，经济富裕到那样一个程度，文学艺术方可能达到某种程度的超脱。因此，他强调说：“后现代对想象的要求在饥饿贫困的非洲地区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在那些仍全力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斗争的地方，这也是不得其所的。”他似乎仍担心中国读者中有人会对此产生误解，于是在序言结束时又一次强调说：“我现在尽可能说得清楚些：后现代主义文学是不能摹仿的，它属于一个特殊的、复杂的传统。”^[6]

当然，佛克马的这种看法也不意味最终的一锤定音。记得当年我引用这番洋人之言驳斥“中国出现后现代主义”一说，就曾被嗤为“仰仗外语优势而垄断话语权，很不后现代”。不过，时

至今日我依然相信：橘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其叶徒相似，而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水土，亦即传统，文化现象（当然也包括文学）是不能离开传统来讨论的。我这里完全不是反对在研究自身文化时对于外来观念的借鉴。我只是想强调，借鉴必须建立在对于对方有一清醒认识的基础之上。就“后现代主义”这个具体概念而言，据我很有限的阅读，这个“主义”本身就涉及面很广，歧义丛生，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现成移用的。像现在这样把人家所谓“后现代主义”文学的特点一二三四地一归纳，与我们自己的现当代文学作一番对照，然后轻易地得出结论说，“中国也出现了后现代主义”，我很担心，这样一种贴标签的做法会产生种种的副作用，至少会使我国文坛上那些致力于创新的文学实验给人以东施效颦的感觉。

因此，我觉得，我们在搬用“后现代主义”这一套话语之前，最好还是先来个隔岸观火，多了解一下人家到底说的是什么。把这个问题大体上搞明白了，再决定需要不需要、能不能借鉴也不迟。詹明信不是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下资本主义阶段的文化逻辑”吗？我对这样一个提法颇感兴趣。我们何不就把“后现代主义”问题作为一个切入口，着实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现状来一番从里到外的考察和审视呢？美国新新闻主义小说家汤姆·沃尔夫（Tom Wolfe）曾把光怪陆离的纽约大都会比喻为一头百足兽，他说要把这里发生的一切写成一部大部头的小说，是一个最诱人、但又是富于挑战性的想法。为什么？因为纽约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缩影，它是一种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的生动的现实。对于西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是在捕捉这样一头百足怪兽。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挑战性时，我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三年过去了，我一直在阅读这方面我所能

找到的各种有关的论著和文献。我觉得,考察就必须追根溯源,所以,我更关注的是人家提出的问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这些问题,他们就这些问题是如何进行思考的,他们的思考引出了哪些试探性的结论等等。

阅读和思考似乎越来越坚定我的这样一个想法:“后现代”问题的提出,固然涉及到时代分期问题,然而从根本上说,它更是一个如何认识和评价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现状问题。这显然就成了一个无法找到现成结论的难题。非但没有结论,任何对问题的回答只会引出更多的问题。“后现代”、“后现代主义”的问题提出后在西方思想理论界所引起的激烈争议,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大相径庭,换一个角度看,实际上反映的是人在认识自我时的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困惑。这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我是谁?”这是一个永远没有最终答案、因而也就永远将存在的问题。这些年来,不少人问我,我自己也常常问自己,究竟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能不能为“后现代主义”下一个明确无误的定义,让我们一劳永逸地摆脱那没完没了的争论呢?我做不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自己的看法。我的确设法在一个我认为可行的认识层面上对“后现代主义”作出我自己的理解,而这也正是我把我的这番思考定名为“人文的困惑与反思”的缘故。

“后现代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因而,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思考,也就不可避免地呈现为多头并进、此长彼消(或可读作“扬此抑彼”)的状态。在某一个问题上,你沿着某一个思路的思考似乎是可行的,在另一个问题上,你沿着另一条思路的思考似乎也是可行的,然而,这两条思路的思考和通向的结论却完全可能是相克相消的。这就是解构哲学所面对的“解构”,我

现在算是对于“解构”有了一点切实的体会。尽管我把自己的思考划分为三大片：背景论，思潮论和人物论，这每一片又包括了或平行、或递进的若干个子问题，这样便似乎使思考具有了某种系统性，但是我清醒地知道，语言这种试图抹平思辨的罅隙的努力只是一种徒劳。“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弹丸在下”，我在对西方后现代的思考进行反思和批评之后，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注 释

- [1] Daniel Hoffman, ed., *Harvard Guide 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Writing*,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5; pp. 7-11.
- [2] Fredric Jameson, "Foreword," to Jean - 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pp. ix - x.
- [3] 陈晓明《无边的挑战：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第13页。书中专门有一节“趋同与变异：中国产生后现代主义的前提条件”，论证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和文化氛围“给予‘后现代主义’的产生提示了最低限度的历史条件”。
- [4] 佛克马、伯顿斯编《走向后现代主义》，王宁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
- [5]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xxii.
- [6] 同[4]“中译本序”，第1-2页。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背景论：“后现代”与“后现代主义”	1
一 “后现代”：从一个问题变成一个课题	3
1. 哈桑的“不确定的内在性”	5
2. 弗·詹明信的“文化主导因素论”	7
3. 利奥塔的“叙述危机论”	9
4. 哈贝马斯反对“后现代”的历史分期	11
二 作为时代分期概念的“后现代”及其认识背景	15
三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定义	25
四 “语言学的转向”	39
五 语言“表征”的再审视	57
1. 语言表征：人与世界的中介	58
2. 所谓的“表征危机”	61
3. 语言自我认识的变化	65